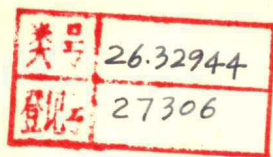


漢學研究

尊
信
靈
藏
肅
共

愛也天可重子令
常修那千變無
弟生也意悲
對可夫
而交決



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漢碑研究

齐鲁书社

主 编

邹振亚 王思礼 赖 非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山东分校

新
闻
刊

汉 碑 研 究

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印张 14插页286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

ISBN 7-5333-0175-7

J·8 定价：7.20元

编者的话

汉代碑刻，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分布于山东境内的两汉碑版与刻石（以下总称汉碑），无论从数量上或从质量上，都雄踞于全国首位。组织力量整理、研究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开展学术交流，促进现代书法艺术的全面发展，成为书法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与中国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在泰安市文联、济宁市文联的积极协助下，于1989年9月，在文化名城泰安、曲阜，举行了“中国汉碑学术讨论会”。

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及日本、香港的专家、学者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有三十六位老、中、青作者，宣讲了自己的论文要点。对汉碑从书学、文字学、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以及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参加交流（包括书面）的论文计57篇。

这次讨论会，是我国汉碑研究史上规模最大、层次较高的学术讨论会。是书论家、书法家与石刻研究、考古工作者继1984年掖县“云峰诸山北朝刻石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合作。与会者除了会议交流和讨论之外，还在泰安市、曲阜

FH3-60

市和济宁市，实地参观考察了这里珍藏的丰富的两汉碑石。

此次学术讨论，不仅从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对汉碑艺术进行了纵向的研究，而且从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宗教乃至建筑等方面，进行了横向探讨和比较。这种纵横交错的探求，使得研究的课题更加广泛、充实。许多论文，对于汉碑的产生、形成、发展、演变、风格、分期、影响和汉代隶书的审美意识以及碑刻的文字、内容、形制等等，作了颇具见解的研究、考证。汉代除碑刻外，尚有简牍、帛书、陶文、砖瓦文字、印章等等，论文中均有涉猎。还有人将汉代隶书分作“草隶”、“美术隶书”、“典型隶书”和“通俗隶书”等类型，进行分析比较。也有人对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晚期，在汉字书体剧烈变革中，篆书如何演变到古隶、汉隶，又如何孕育了楷书、行书，汉简草书、章草、今草、楷书的发展脉络，它们的交叉、过渡程序等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会议还提供了一批新发现和首次披露的汉碑资料。汉碑见之于历代著录者，凡七百余种。解放前，石存百七十种许；解放后新发现的碑刻，据不完全统计，接近百种。山东近年新出土两汉碑石九块、汉画像石题记十六种、榜题四十四种以及新发现的摩崖刻石等，会议亦有论文一一介绍。首次公开的《张山子熹平三年残碑》、《穰盗刻石》、《陶洛东汉残碑》等珍贵资料，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此次会议得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协理论研究部、《中国书法》杂志、上海《书法》杂志、《书法研究》、湖北《书法报》和香港《书谱》杂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谨表谢忱！

现将“中国汉碑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成集。题名《汉碑研究》，共辑论文等39篇。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试谈碑刻研究的改革	邹振亚(1)
论山东汉碑	翁闾运(12)
汉碑源流、分期和碑形释义	王思礼 赖 非(24)
汉碑与汉印	刘 江(37)
东汉墓碑溯源	范邦瑾(49)
汉隶的发生和发展	刘 永(64)
从汉碑看汉代的书法审美趋向	王长水(75)
汉碑的分类与书风	〔日〕浦野俊则 刘艺译(89)
论东汉书艺的勃兴	徐 畅(98)
汉代隶书的书写与契刻	邢增庆(117)
隶书的审美价值	郭 恒(125)
汉代书风与后世隶书的得失	卜希旸(136)
简论东汉书法艺术风格	张荣升(143)
汉学与隶书	潘良桢(155)
汉代书法分期	村 庄(172)
汉代通俗隶书类型	赖 非 王思礼(192)
隶书起源及其他	姜宝昌 潘景年(212)

清代碑学兴起时期的汉碑隶书创作

- 及其美学意义 王南溟(221)
- 汉隶书法流变之我见 范正红(234)
- 汉《孔宙碑》要论 杨鲁安(240)
- 曲阜汉代碑石的历史价值 骆承烈(252)
- 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考略 李鹤年(260)
- 汉隶长垂考略 陆锡兴(267)
- 陕西现存汉碑赏析 钟明善(274)
- 《张迁碑》研究发微 张乃森(283)
- “八分”为书写格式新解 张果詮(292)
- 汉碑额的艺术特色及其影响 王渊清(299)
- 试论蔡邕与熹平石经 许云端(307)
- 汉郭有道碑考 胡月(320)
- 山东两汉碑刻真伪考三例 王思礼 赖非(332)
- 鲜于璜碑与汉隶书坛 马大东(340)

山东新发现的两汉碑石及有关

- 问题 令 璽 下 坡(346)
- 曲阜《陶洛东汉残碑》 关啓生(367)
- 新发现的《张山子熹平三年残
碑》..... 李哲先 李锦山(374)
- 济宁的两块汉代刻石 宫衍兴 李一(380)
- 邾国故城汉代陶文 胡新立(385)
- 齐鲁汉碑旧拓见闻 王壮弘(392)

山东汉碑杂谈	滋 兰(396)
山东现存汉代碑石要目	村 庄(404)
附：图版26幅	
后记	

试谈碑刻研究的改革

邹振亚

碑刻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从诞生到现在，已有千余年悠久历史。在其形成、发展、完善自身体系的过程中，为书学、史学、文字学、民俗学以及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做出了贡献。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如何全面地总结它的过去，使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活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便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认真总结研究经验

碑刻属于金石学中“石”的研究范畴。其著录、研究，肇始于汉、魏。《史记》、《后汉书》、《洛阳记》、《西征记》等，最先著录了秦代刻石，当为我国碑刻研究之滥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比较详细地著录了汉魏碑刻120余种。南朝梁元帝时编纂的《碑英》百二十卷，是集录碑文资料的第一部专门著作。唐代，“石鼓”出土后，著录研究者益伙。北宋时期，碑刻研究推出了第一个高潮。这时，金石学作为一门学科，便逐步地形成了。其标志不仅是出现了众多有成就的金石

学家和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吕大临《考古图》、王楚《博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等），重要的是，对石刻的收集、著录与研究，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规模。在具体方法上，也有了一定的程序。金、元、明三代，碑刻研究转入低潮，明代虽有陶宗仪、杨慎、都穆、赵崡、郭宗昌等人的努力，但终未逃出宋人窠臼。清代，碑刻研究复出第二高潮，对于宋以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得以全面继承，且拓宽了原有的研究范围，补充了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研究体制和初具规模的理论架构。著录较丰者，有吴式芬《捃古录》、孙星衍、邓澍《寰宇访碑录》、冯云鹏、冯云鹤的《金石索》；考订较精者，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通纂较详者，有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等。其收录之皇皇，审订之详核，考察之精细，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金石学研究的局限性。它在著录、摹写、考释和评述等方面，并未穷涉碑刻资料的全部内容，其研究，也基本停留在以鉴赏和补苴为主的方法上，对碑刻作系统综合的宏观考察，则从来没有过。这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点，就使得这个学科的生命难以为继，不能不逐渐萎缩。所以，自二十年代开始，便迅速为考古学所取代，金石学从此一蹶不振。

碑刻研究，虽然曾经出现过每况愈下的暗淡时期，但它的历史毕竟延续了千余年之久，其所以能够如此，究其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资料直接、内容丰富、流传时间长等特点。金石学从整体上说被考古学取代，但它的具体内容却依然存在，其潜力是无穷的，客观上具有恢弘浩繁的基础和开发利用这些极

为充实的历史资料的迫切需要。足以说明，这门学科存在着复兴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有人呼吁建立现代石刻学，这是不无道理的。

从书学上讲，如果说乾、嘉时期金石学的繁荣导致了书学观念的更新，从而为书法开拓了崭新的领域的话，而今天书法的创新，同样要求对传统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发掘与吸收，这就给现代碑刻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建立新型的碑刻研究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是加强现代书法理论基础的任务之一。

二、更新知识结构，注重研究方法

汉、魏以来，特别是经宋、清两代的努力，我国碑刻资料的收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对既有的多种资料，并未能充分利用。这当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整理问题，综合问题。碑刻研究的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进展，都是由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实现的。因此，需要更新知识结构，注重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以适应文化的发展。

碑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除当时丧葬习俗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孤立地、片面地研究它们，就很难达到接近历史事实的地步。需要认真地分析、细致地考察它们的每一个方面及其全部联系，客观地掌握由各个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规律。这就要求具有比以往一切金石学研究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综合思维能力。

综合思维能力是现代各门学科发展的需要。这种综合化，

是建立在长期的各分支细致研究的基础上的。汉魏以来的金石学研究，正是以各个分支、各个环节的细致研究为特点的。今天我们既需要对各环节进行细致的探讨，更需要综合的广泛认识。没有这种综合而广泛的认识，研究工作充其量只不过是乾嘉水平。要想取得碑刻研究划时代的成就，如果不用现代化理论装备自己，培养自己的高度思维能力，是很难实现的。

提高综合思维能力，必然要注意拓宽认识和研究领域。鉴于碑刻研究的具体性质，我们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去研究碑刻书法的成就以及对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碑刻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碑刻源流、形制及分期；碑刻文体特点、种类与演化；碑刻演变反映的社会思潮和民风民俗问题；碑刻的地域性特点及历史地理问题；碑石镌刻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和对岩石物理性质的认识问题，还有它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科技史、民俗史上的地位，等等。凡此种种，都需要丰富的书学知识、古文字学知识、历史知识、考古知识、地理知识、民俗知识乃至岩石、镌刻知识等。

进行综合研究，除具有广泛的与碑刻相关联的知识外，还需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已经看到，我国历史上以往的诸多碑刻研究，其方法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单一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这种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碑刻研究应该是碑刻本体论和碑刻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本世纪以来兴起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论等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引入到碑刻研究中来，是不无裨益的。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在研究两汉碑刻书法过程中，提出了书法类型的形成以及各类型相互影响、渗透与制约是书法发展的机制；在对隶书各类型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楷书形成的观点等。

三、资料的合理化利用

人们要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无疑要凭藉历史留下的各种资料。我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有文字的，也有实物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佚散，有的损毁，有的残缺，有的则便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自然的社会的因素，对研究工作的制约，有时甚至使研究人员无可奈何。然而碑刻中保存的大量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对较早社会阶段的研究，有其特殊意义。他不仅具有能够长期保存的优点，其史料来源也更直接一些，尽管也需要一个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目前，对于碑刻中那些以只言片语或残鳞断甲形式存在的大量信息，绝大部分尚未得到应有的综合性开发与利用。从书法继承的角度讲，碑刻则是更为直接的参考借鉴资料。其信息的储量，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代有人慧眼独具，在被馆阁体严重封锁的书坛上，吸收、借鉴碑刻书风，另辟溪径，冲出一条成功之路，可谓书史上一大壮举。以至现在，仍然还有不少书法大家沿着此路辛勤耕耘。而今，书法空前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书坛上热火朝天的局面，是过去不曾多见的。在一片激昂的“创新”口号喊出之后，不少人在作冷静的思考，其中的内容总是围绕着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焦点在于对传统的“取”与“舍”上。这个问题，不仅书法理论工作者需要进行长期探索，即使对于侧重于书法实践的书家来说，也不能不去作认真思考。眼前的事实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在我国碑刻资料如此充实、如此丰

富的客观条件下，使我们迫切地感到目前的开发利用的状况，与书法艺术事业发展的局面，显然极不适应。要使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焕发生机，就需要在碑刻资料（当然还有其他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鉴别与清洗、交流与利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碑刻资料整理与利用方面严重落后的状况，首先要解决碑刻资料散乱而不集中的矛盾，改变不系统、不完整的资料存在方式。马克思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多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充分地占有材料，是整个研究工作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由于碑刻资料自身的特点，传统的交流、收集方式，主要是依靠拓本的椎拓与流传。拓本在研究中的作用之大，以至在印刷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没有降低其价值。解放以前，拓本的流传主要依靠亲朋好友的相互借阅、馈赠、交换，以及拓本商人的媒介作用。一般情况下，收集丰富的拓本，并非是不可及的难事，而今收藏家们的藏品，有的佚失，有损坏，有的在战争期间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散或被付之一炬。有的则流散于国外，重新被博物馆所收藏。以数量言之，可以称富者，已经寥若晨星。古代碑刻严禁大量椎拓，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这在资料开放问题上难以两全其美的。然而，对资料的控制和封锁，却为我们自己设立了重重人为的障碍，成了国内研究人员的桎梏。外国人，可以通过充足的财力，到各地随意购得所需拓本，我们自己却因单薄的经费而无能为力，只可望而兴叹的了。文物要得到保护，法令也要执行，这与研究工作并非背道而驰。但目前资料管理与利用上所存在的混乱现象和严重问题，却不能不说是反映了小生产的狭隘意识。如何妥善

地解决好保护与研究的矛盾，是研究人员十分关心的问题。现代先进影印技术在发展，固然还可以利用影印的手段来为碑刻研究服务，为研究人员创造条件。近年来，出版部门曾经影印出版了不少碑刻资料，是很好的现象，但大都侧重于书法临习范本方面，这与解放初期的出版倾向并无大的差别。大量存在于民间的作品，仍然被弃置于冷宫而不屑一顾，这是我们在资料收集与整理上的薄弱环节。事实上，这些民间作品不仅生机勃勃、活泼可爱，对研究当时书坛的全部真实面貌，亦无疑是不可缺少的。

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以有限的精力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需要研究这个领域的许多人以及有关出版部门的积极协作和密切配合。在资料的年代与真伪鉴别、文字校勘与考释等一系列基础工作做扎实之后，编辑出版各种各样的科学性较强的资料集，一可使容易失散的资料得到长久保存；二可使研究人员得到方便，提高劳动效益，而不至于把很多精力浪费在零零星星的资料检点中。这项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因此说，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出版，是研究工作至关重要的任务。这是目前最困难而且又急待解决的问题。

四、创办学术机构和议论阵地

我国历史上碑刻研究的状况，一直是人力少，机构缺，而且是分散的个体劳动。以这种原始的劳动形式与结构，来应付跨越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包括内容多为特点的研究工程，显然是力不能及的。相反，能够适应需要的，不仅要有相当数量

的现代化知识结构武装起来的研究人员，更要有研究力量的合理配置，并根据各个研究课题、研究阶段的特点、要求，按照最优化原则慎重地加以调整与部署，才能使我们的有限力量不致丧失于内耗和各种重复的乃至无效的劳动中去。因此，石刻研究的专业性或协会性机构的建立，及其调节很有必要。它的组成，既要有书法理论工作者、考古、文字、拓本、历史研究工作者，还要有部分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研究工作者和篆刻工作等人员参加。由这样一部分人配合攻关，其智能的诱发和利用、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才是高效能的。

这样一个研究模式，今天已经有人开始构筑了。如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原石刻艺术馆等专门收藏、研究机构的建立，乃是前所未有的百年大计。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建立伊始，即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通力合作，组织了包括：书法、考古、历史、宗教、地质、测量、绘图、推拓及摄影等方面的专业队伍，对云峰、天柱、大基、百峰四山北朝摩崖群刻进行了综合考察与研究。他们既分工又合作，大大提高了研究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社会化程度。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于1984年联合举办的“云峰诸山北朝刻石学术讨论会”上，推出了一批新成果，取得了自宋代以来的新突破，得到了国内专家学者们的赞扬和肯定，也引起了专程来华出席学术讨论会的外国朋友们的注目。清代乾、嘉以后的百余年间，很多金石家毕生致力于斯，试图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发见，尽管他们也曾往来于四山之间，奈何终无新的建树。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分散的个体劳动的局限性有关。

另外，还要有同其他学科的合作与联盟。例如，为了更好